

《分門古今類事》的敘事策略

康 韻 梅*

摘 要

《分門古今類事》是南宋委心子所編撰的小說集，《宋史》〈藝文志〉中未見著錄，《四庫全書》卻將之歸於子部小說類，視之為具有撰作意識的作品，而非全然抄錄舊聞的類書。本文嘗試從《分門古今類事》中大量改寫的唐五代小說的敘述面貌，探索出《分門古今類事》重議論輕記事，以及標示改易和期使情節合理化的敘事策略，致使全書撰作宗旨單一而清晰的指向命定觀，因而帶有強烈的警世色彩；而在敘述特色上，呈現人物形象的弱化、情節縮合的鬆散、意涵建構的貧乏和氛圍塑造的不足等現象，充分的顯示出全書在敘事美學上的退化，卻著重以故事訓誡世俗的作用。而本文的深入探討，也具體展現出宋代小說引用前人之作的一個面貌，並藉之彰顯魯迅評述宋代小說多講古事和多示教訓的論點。

關鍵詞：分門古今類事、唐五代、宋代、小說、敘事策略

一、前 言

《分門古今類事》是南宋委心子所編撰的小說集，¹《宋史》〈藝文志〉未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 李劍國根據《分門古今類事》卷8所載〈先大夫龍泉夢記〉，記宋如璋乞靈龍泉廟，所遇曾吉夢報祥之事，推斷委心子姓宋，宋如璋為其父。而從題注「眉州青神縣有龍泉神廟」，及《眉州屬志》所載青神縣有龍泉寺，推知宋氏為眉州青神人。此外，復根據〈先大夫龍泉夢記〉所記：「崇寧乙酉歲，如璋避親，移試漕臺，……是年拔漕解，次年果叨第。」以及《眉州屬志》〈選舉志〉記崇寧進士中有「宋如璋」，並注眉州雁塔題名碑作「宋如璋」，而得知宋如璋為崇寧五年進士。李先生復指出「委心子」語本《淮南子》〈精神訓〉：「委心而

見著錄，²傳為二十卷本，分見載於《四庫全書》和《十萬卷樓叢書》，二書分卷和條目相同，但《十萬卷樓叢書》本前有委心子的自序，名為《新編分門古今類事》，³《四庫全書》本題為《分門古今類事》，⁴未見委心子之序，故不著撰人。然二本差異最顯著者則為故事所注出處來源不同，李劍國指出庫本所注引書較全，但錯誤亦多，十萬卷樓本雖注引書甚當，但多缺遺。⁵

《分門古今類事》（以下簡稱《類事》）全書分為十門，分別為〈帝王運兆上、下〉二卷，〈異兆上、中、下〉三卷，〈夢兆上、中、下〉三卷，〈相兆上、下〉二卷，〈卜兆上、下〉二卷，〈讖兆上、下〉二卷，以及〈祥兆〉、〈婚兆〉、〈墓兆〉、〈雜誌〉各一卷，共十八卷，又附〈為善而增門〉、〈為惡而削門〉各一卷，全書共二十卷，前十門即相應於委心子於序所言「凡前定興衰、窮達、貴賤、貧富、死生、壽夭，與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飲一啄，分已定於前，而形于夢，兆於卜，見於相，見應于讖驗者，莫不錄之。」⁶根據其類分為十門；末二門則指「謂命已前定，有為善而增者，有為惡而削者」。即全書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發揚「興衰窮達死生六者，天之所賦」、「天定可以勝人」之義；而後一部分則旨在闡釋「智愚善惡此四者，人之所為也」、「人定亦能勝天」之理，以達到「使猖狂譟進迷惑競利之徒見之而少解」、「庶幾善人君子當正心修身，樂天知命，不以人廢天，不以天廢人」，欲人知命認份，同時不忘正己修身的撰作本意。然由十八卷之

不以慮」，根據卷5〈柏閣行者〉云：「知命君子委心而任之可矣」，認為「委心子」為處士之流。見氏著，《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1997），頁307。

- 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分門古今類事》二十卷，不著撰人，《宋史》〈藝文志〉亦未著錄，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4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2。李劍國卻指出著錄於《宋史》〈藝文志〉類事類，同註1，頁307的注1部分。但查考《宋史》〈藝文志〉類事類則實未見，僅有《類事》十卷，不知是否即為《分門古今類事》。
- 3 李劍國指出「十萬卷樓本前多委心子自序一篇，題為〈蜀本分門古今類事序〉，亦出蜀刊，但書名《新編分門古今類事》，新編二字蓋書坊重刻時所加。」同註1，頁308。
- 4 李劍國指出：「庫本係浙江巡撫採進本，原本題《蜀本分門古今類事》，無序，結一廬藏本殆同此本，原出宋刊，刊於蜀中，故云蜀本。」同註1，頁308。
- 5 同註1，頁308。
- 6 見金心點校，《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北京：中華書局，1987），序，頁1。金心根據《十萬卷樓叢書》本點校的《新編分門古今類事》為本篇主要引書所據，又參酌《四庫全書》本的《分門古今類事》。故以下引述，則不再贅注。

於二卷的比例而觀，全書仍是側重在「命有定數，不可以智求」的宗旨，每一門皆搜列古今相關故事，大抵以四字為目，⁷並注明出處，形式上為一標準的類書體例，而書名「分門古今類事」亦充分顯現了全書之性質，若《宋史》〈藝文志〉真將其歸類為子部類事類，實有其據，李劍國便界定《類事》為專題性的小說類書，但因為有保存資料，擴大影響之功，而認為可以視之為小說集。⁸而《四庫全書》逕直將《類事》歸類為小說家類異聞之屬，與宋代異聞小說《睽車志》、《夷堅支志》、《續博物志》等並列，《提要》並言：

大旨在徵引故事以明事有定數，無容妄覲，又推及於天人感應之捷，以著惠迪吉從逆凶之所以然，雖採摭叢瑣，不無涉於誕幻，而警發世俗意頗切至，蓋亦《前定錄》、《樂善錄》之類，且其書成於南渡之初，中間所引如《成都廣記》、《該聞集》、《廣德神異錄》、《唐宋遺史》、《賓仙傳》、《蜀異記》、《搢紳勝說》、《靈驗記》、《靈應集》等諸書皆後世所不傳，亦可以資博識之助，故存之以備小說家之一種焉！⁹

從中可知《四庫全書》將之納入小說家類的原因，主要有：一為全書的幻誕風格和警發世俗的用意，與《前定錄》、《樂善錄》等書相類；另一則為《類事》保有今已不存的多種宋代小說。《四庫全書》的觀點，除了著意於《類事》的保存功能外，也注意到了它在文本上的撰作特色。

或許我們可以從在《四庫提要》中與《類事》並提的《前定錄》和《樂善書》的特質進一步來理解《類事》。《前定錄》殆為唐鍾輅所撰闡釋命定之書，今本自序有云：「大和中讎書春閣，秩散多暇，時得從乎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¹⁰雖自言進士中第，

7 除卷2〈一殿三天子〉、〈城下三天子〉、卷8〈張君房靈夢志〉、〈先大夫龍泉夢記〉、〈蒲教授荊山夢記〉五篇外，餘皆以四字為目，主要是以故事主人翁和其代表事蹟的結合命名。

8 李劍國認為《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三大類書的編成，造成了宋人的類書熱，類書中常採稗官小說，無疑有保存資料，擴大影響之功，而一些專題性小說類書，例如宋初《通鑑錄異》、《窮神記》，南宋的《分門古今類事》，也可視為小說集。此外還有一些分書摘錄小說雜書的叢編，如《續談助》、《紺珠集》、《類說》，對小說創作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同註1，前言，頁12。

9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7冊，頁3。

10 見《唐人百家短篇小說》（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215。

於「讎書春閣，秩散多暇」之際，¹¹ 纂集眾說而成，其中亦不乏出於編造者。¹² 由此可見《前定錄》不盡為記錄前人典籍有關命定的故事，亦有鍾輅的編造。換言之，《前定錄》全書性質不全為「錄」，亦有「撰」的特色，是故《新唐書》〈藝文志〉將之著錄於小說家類，《宋史》〈藝文志〉亦延襲其分類，《四庫全書》則將之著錄於小說家異聞之屬，與《類事》同，完全符合其將二書並提之意。然從近人的研究成果，有一值得思索的情況，亦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著錄了北宋尹國均《古今前定錄》二卷，其書已佚，李劍國將晁氏刪略原書之序作為概述《古今前定錄》內容的文字，與《類事》的序言比較，發現二者多所雷同，推得《類事》是在《古今前定錄》的基礎下擴編而成的。¹³ 由此而觀，《古今前定錄》則遠較《前定錄》更為接近《類事》，惜今其書不存，難以細察二書的相關處。

至於《樂善錄》則為南宋李昌齡所編纂的志怪小說集，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云：「蜀人李昌齡伯崇撰。以《南中勸戒錄》增廣之，多因果報應之事。」¹⁴ 根據《直齋書錄解題》的說法，《樂善錄》與《類事》有二值得注意的相似之點，即二書編纂者皆為蜀人，又二書皆由收集古今故事編撰而成，且多注明出處。《四庫全書》將此二書並列，實有所據。此外，李劍國特別指出雖然李昌齡「以勸善戒惡為旨，纂集古今故事，……少數係作者自述聞見，因此並不純粹是編纂舊事之作。由於作者力求『有補于

11 李劍國由徐松《登科記考》卷20，查考鍾輅為大和二年進士。又《前定錄》結銜為崇文館校書郎，則知其於大和中任崇文館校書郎，見氏著，《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1993），頁603。

12 周勛初和嚴杰引述《唐闕史》卷下〈鄭少尹及第條〉：「世傳《前定錄》，所載事類實繁，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驗者。」之語，提出唐人已認為其中故事有出於編造者。見《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頁388。

13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序云：「右皇朝尹國鈞輯經史子集古今之人興衰窮達、貴賤貧富、死生壽夭，與夫一動靜、一語默、一飲一啄，定於前而形於夢、兆於卜，見於相貌，應於讖記者，凡一門，以為不知命而躁競者之戒。至若裴度以陰德而致貴，孫亮以陰譴而減齡之類。又別為二門，使君子不以天廢人云。」見《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7），頁787。李劍國認為「晁氏所敘必是據原書自序刪略而成」，而《類事》委心子序與此相吻，甚至以德至貴、以譴減壽的例子，所舉皆同。不過尹書是以前定事為一門，善惡報應事為二門，共三門二卷。《類事》前定事有十門，加上善惡報應事二門，共十二門二十卷，增補甚多。同註1，頁309。

14 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344。

名教』，所以各事之末都繫以議論，而且多是長篇大套，而於事實反倒不求其詳，粗陳梗概而已。」¹⁵ 姑不論長篇議論出現於小說敘事的藝術評價為何，但「自述聞見」和「繫以議論」，則意味著《樂善錄》並非為一照錄前作之書，亦有李昌齡的「作意」¹⁶ 存在。《四庫全書》將《類事》置於小說類異聞之屬，必然發現了它所具有的小說特質，其中很重要的是與《前定錄》、《樂善錄》相應的「作意」。即它並非純然是一無撰作意識、徵引前人之作的作品，對於敘述形式和故事意涵的建構，《類事》必然有其著意之處，換言之，此書具有值得關注的敘事策略。

本文嘗試藉由唐五代小說在《類事》被改易的敘述面貌，具體地顯現出《類事》敘事策略。之所以擇取唐五代小說的因由，主要是《類事》大量收錄了今仍留存的唐五代小說作為編撰題材，值得注意的是《類事》在今見的二十卷本中，約略有 89 則出自唐五代小說，¹⁷ 成為宋代文言小說收集唐五代小說作品之最；又《類事》雖然亦多收錄宋代文言小說作品，但原書大多亡佚，《類事》反而成為保存其敘事的唯一存書，自無從兩相比較敘述形式的異同。此外，唐五代小說作為一種較為成熟的敘事被賦予新的敘述面貌，正足以展現兩者敘述形式的差異，以及不同敘述形式所含藏的意義訴求和敘事效果，《類事》的敘事策略，便可由此彰顯。

二、《分門古今類事》中的唐五代小說敘述面貌 所彰顯的敘事策略

《類事》承襲了為數可觀的唐五代小說，而這些小說的敘述面貌，已幡然

15 同註 1，頁 302。

16 此「作意」之詞，探胡應麟對唐傳奇之評「……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見《少室山房筆叢》卷 2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86 冊，頁 387。魯迅闡釋其意為「意識之創造」，見《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2），頁 59。據魯迅闡釋的意涵延伸，「作意」即作者意識在形式和主題上的展現，本篇則針對敘事作品，特別強調的是敘事策略所達成的意義建構和敘事效果。

17 若加上注出宋代作品、其本事實為唐五代小說者的 30 則，則有 119 則。參見拙著〈《分門古今類事》中的唐五代小說〉一文，即將發表於《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10 期（2004.12）。本篇有關《分門古今類事》中唐五代小說著錄和輯存的基本資料，以及敘述面貌，都得益於此篇的研究成果。

改易，即在題材為「舊」的前提下，此書基於其所考量的因素，嘗試賦予唐五代小說一個「新」的面貌。就敘事的觀點而言，不論題材相同與否，只要重新被敘述，就可能有新的敘述面貌，而這個新的敘述面貌，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敘事意義和效果。若論及《類事》中唐五代小說「新」的敘述形式及其構設的意義，全書輕記事重議論的敘事策略，是非常關鍵性的影響因素，今分別從「重議論」和「輕記事」來論述此書的敘事策略，及其所構設的意義和對於敘事效果的影響。同時也嘗試指明《類事》在「重議論」、「輕記事」之餘，為標示改易和期使情節合理化所做的某些引人注目的措意。

(一) 重議論的敘事策略及其意義建構

唐五代的小說作品在《類事》中出現的敘述面貌，最令人矚目的是，在小說敘事中比較為人看輕的編撰者的議論，¹⁸竟大量的出現，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庫提要》中與《類事》並提，同樣強調命定觀的唐人鍾輅所撰寫的《前定錄》，就今所存的文本來看，沒有一篇具有鍾輅的議論；但另一並列的南宋李昌齡所撰之《樂善錄》則與《類事》呈現了同一傾向——議論的大量出現。若從宋代小說多承繼前人作品題材的情況而觀，或許添加或注入編撰者的議論，可以作為一個表現撰作意識的重要舞臺，展現創意，形成全書的敘事策略，而這個敘事策略所導致的敘述形式和對於故事意義建構的影響，便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今試就《類事》編撰者議論涉入文本中的情形，大致分為：故事後增附議論、改易原作撰者附於故事末之話語、以議論取代記事三種，論述於下：

1. 故事後增附議論

《類事》往往在原作故事之後，增附編撰者的議論，例如卷3〈馬植黔南〉¹⁹與原作記事部分幾乎完全相仿，然而〈馬植黔南〉在故事之後，多出一段編撰者的評論：「噫！行止豈復由人哉！出將入相，各以數至，唯聖智

18 美國的文學批評家布斯於其著名的《小說修辭學》中，述及評論家往往譴責小說中作者的聲音——議論，但他主張客觀而精確地去看待這些議論在作品中的貢獻，於是他提出數種小說中議論的作用，見W.C. 布斯（Wayne C. Booth）著，華明、胡蘇曉、周憲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189-232。

19 《十萬卷樓叢書》本注出《本事詩》，今見《本事詩》〈徵異第五〉，《四庫全書》本注出《本事傳》，殆誤，《太平廣記》卷138有載，題作〈馬植〉。

不能迴也。」將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又除黔南，復入朝為大理卿，繼而拜相等人生的際遇，訴諸「命數」，並言明這是人之「聖智」所不能改變的，如此一來，全篇故事的主旨便由此議論明白揭示。在原作《本事詩》中則未作任何議論，然由全書之序所云：「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於群書，雖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²⁰可知《本事詩》視此則敘事為「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²¹詩的寫作背景，即交代出這首詩在什麼情況下被創作出來，藉以瞭解詩的內容，於是這一則敘事文本的意義便不限於命數。又卷6〈奚陟推案〉²²原作僅以奚陟取其當年所記之夢驗證，竟無毫分之差作結；但〈奚陟推案〉則在其後加上了一段編撰者的議論：「嗟呼，陟之貴為吏侍已先定於十五年前，固無足怪，而茶甌之行，文案之推，吏書之霑污，亦復皆有定數，豈偶然哉，因備錄之，以為世戒。」不但以命定釋奚陟為官事，甚至連茶甌行走、奚陟推文案、吏書的沾污都訴諸命數，正印證了書序所言：「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飲一啄，分已定於前」，編撰者這一番令世人引以為戒的議論，致使原故事的神異色彩轉向了強烈的命定觀。《類事》在唐五代小說故事之後多附有編撰者發揮命運前定的議論，此於記事後增附議論以點醒故事意涵的敘事特色，實遍見於全書之中。

2. 改易原作撰者附於故事末之話語

《類事》不但直接在唐五代小說原作故事之後增附編撰者的議論，甚至改易原作撰者附於記事之末以示其事的傳奇性和真實性話語，轉為人生際遇皆受制於命運的思維。試以卷3〈正己看牆〉²³的故事為例加以說明，〈正己看牆〉故事大體與原作相符，僅於文字上稍形省略，然〈正己看牆〉文末將原作中說明撰作源由始末的：「成式見臺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

20 見《本事詩》〈序〉，《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237。

21 見《本事詩》，《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1250。而〈馬植黔南〉將「陶鈞」改為「鈞陶」。

22 二本皆出自《逸史》，《太平廣記》卷277有載，題為〈奚陟〉。

23 二本皆注出《酉陽雜俎》，今見《酉陽雜俎》續集〈支諾皋〉下。又《太平廣記》卷137有引，題為〈李正己〉。

事」，²⁴此一由作者現身說法，具有強調其事真實的後設敘述，卻被改爲：「然則富貴真有時，時未至而區區強圖，其蔽甚矣！」的議論，藉之申明富貴有時、人力莫強的觀點。又卷5〈張生得官〉²⁵於敘述上較原作粗疏，尤堪尋味的是原作《冥報錄》以「兗州人說之云爾」²⁶來結束全文，以示關於張生的奇遇是出自於同鄉人的流傳，真有其事；但在〈張生得官〉中，卻以「信乎，一官皆先注定，不可妄得也。」作爲結語，爲張生不能得官之事下一注腳，即透過了泰山四郎的神祇色彩，代表了命數，使得全文有了明確的宗旨。卷14〈崔曙一星〉²⁷原作故事〈崔曙〉對於崔曙應進士舉時，作〈明堂火珠〉詩，有「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²⁸之句，而後崔曙夭歿有一女名星星而無男，遂以「當時異之」作結，偏重的是其事之異，但〈崔曙一星〉既未說明崔曙作詩之背景，同時將原作的結語改爲「星，蓋其讖也」，取以詩讖之意，著重的自然是「讖兆」。又卷18〈敬達玉琬〉²⁹將原作結尾「太僕少卿薛文美同府親見」³⁰強調其事之真的記述，改爲編撰者之評議：「嗟夫！一琬之碎，猶不逃於定數，而況人乎！」藉著一琬之碎皆由前定，來說明人事不可追於定數的觀點。這幾則故事皆將唐五代小說撰者現身說法博徵人物以證實其事之真、或時人稱異的後設敘述，改爲關涉命定思維的議論。

3. 以議論取代記事

24 本篇所引爲曹中孚校點，《酉陽雜俎》，《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732。以下引文則不贅注。

25 二本皆注出《冥報錄》，《太平廣記》卷197有載，題爲〈兗州人〉。今殘存之《冥報錄》未載記此則，因《太平廣記》及《法苑珠林》有載，故朱嵐點注《冥報記》，《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特將之列於輯補。

26 見朱嵐點注，《冥報記》，《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1726。

27 二本皆注出鄭處誨，《雜錄》，《太平廣記》卷198有載，題爲〈崔曙〉，注出《明皇雜錄》，今輯本不存。丁如明校點《明皇雜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因《太平廣記》有載，故將之收錄於逸文的部分。

28 見丁如明校點，《明皇雜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977。

29 二本皆注出《稽神錄》，未見今本，但《太平廣記》卷215有引，題爲〈袁弘禦〉。馬志杰、王高旺點注，《稽神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因《太平廣記》有載，故被列於補遺部分。

30 見馬志杰、王高旺點注，《稽神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4260。

《類事》亦可見將內在於故事的敘事改為編撰者植基於命定觀的評議，即壓縮記述事件的空間取代以議論，例如卷4中的〈固言遇姥〉³¹原作的結局為老姥之女董氏巫在蜀，依李公之勢受人敬事，及至崔相國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判責事金天王的董氏杖背，遞解出界。在段成式記其事之時，董氏尚在貝州，而李公婿盧生舍之於家，則其靈歇矣。〈固言遇姥〉則不述及此，卻發表「富貴早晚有定時，鬼神皆知而人獨不知，善人君子修己以俟可也。」的議論，將原作交代巫者下場的記實性結尾，轉變為人之富貴早已命定、而為鬼神知曉，強調的是鬼神和天命，而未見原作中固然亦展現鬼神的神異，但對於巫者仰仗政治權力，以法術博得眾人敬拜，積累財富，恃勢用事，一旦失去政治靠山，寺廟毀損，便狼狽不堪之情景，有所譏評。更令人矚目的是卷5〈韓澈靈語〉³²引王充《論衡》為所述之事作評：「昔王充《論衡》有曰：『凡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貴者，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以宇文觀觀之，其言豈不信哉！」³³取代原作〈宇文觀〉文末以補述的方式，描述通靈的巫者所見晉故將軍契苾鏐之面貌：「初女巫見鏐，衣冠甚偉，鬢髮洞赤，狀若今之庫莫奚云……」³⁴將原作所突顯具有真實性的傳奇之異，轉變為壽夭貧富皆受制於命定的思維。有時《類事》甚至藉由故事中人物發聲，抒發關涉命定的言語，例如卷3中〈裴度龍鍾〉³⁵的故事對於記事內容多所省略，卻於結尾處加上「(裴度)話天津老人之事，謂其必神仙也，不然何以前知」數句，此為原作《劇談錄》所未載，由裴度之口，說出天津老人為神仙，方能預示其已定之際遇，其用意自在突顯「事有前定」之義。此可謂議論對記事的變相干涉。

這些於敘事中增附或注入議論的情形，十足顯示編撰者「介入」的決心，他直接由對故事內容的評價，和對其中人物的情感投射，塑造出其欲表

31 二本皆注出《西陽雜俎》，今見《西陽雜俎》續集〈支諾皋〉中。

32 二本皆注出《廣異記》，《太平廣記》卷336有載，題作〈宇文觀〉。

33 文中所引《論衡》，出自〈命祿篇〉，然文有參差，《類事》實刪略原文引述，可參見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20。

34 見〈宇文觀〉，《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頁2670。

35 二本皆注出《劇談》（即《劇談錄》），今見《劇談錄》卷上。《太平廣記》卷138記載此事，題為〈裴度〉。

達的意念。這些數量驚人的議論把命定的價值灌輸給讀者，形成全書的修辭策略。³⁶這一點特別可由他將記事的文本，轉變為編撰者的評論看出來，他並不像《前定錄》般直接由事件人物的行徑來暗示故事意義，而是經由表述價值和信念的言論，作直接的傳達，使得原作中往往需要再加以闡釋，可以作多重建構的意義，有了一定的趨向，甚至背離了原作可能具有的意涵，例如在諸多唐五代小說中強調的是人物行徑的傳奇性，在《類事》的記述下，卻化為一種超於人力可預的命定觀。全書敘事多採議論形式，所欲建構的意義竟是歸於與其書序言相符的命定思維，而這命定思維的內涵並不是編撰者予以重構，以逾越一般的價值和信念，而是眾人普遍就已接受的觀點，³⁷其中雜揉著神諭的宿命，藉由神仙異人或奇夢怪徵的預示，實踐在人的壽夭禍福貴賤窮達上，同時不忘強調人之善惡所導致的遭遇，這些觀點並非只見於《類事》，當時眾多的小說亦以之為主題，甚而見於前代的撰作，然而《類事》直接訴諸議論，強烈地展現了以定數為誠命的導向，而使全書具有了濃郁的警世色彩，因此讀者毋須經由反覆推敲敘事的形式和內容去掌握故事的意義，只要經由文本中表達觀點的議論，便可輕易知悉。這即是《類事》編撰者的立意所在。

（二）輕記事的敘述策略及其敘事效果

《類事》除了積極的以議論來展現「作意」外，在文本的記事部分，則擇取原作與「命定」思維相關的文本記述，以符合每一門的主旨，故其記述的目的不在故事的本身。在前述討論《類事》的議論運用時，雖然已見以編撰者的評論取代原作故事結局記事的情形，可以說是重議論導致了輕記事的結果，但《類事》中的敘事，不必然假借議論來達到全書撰作之旨，而可藉由改易原作故事本身來完成，所以「輕記事」自然可視為《類事》敘事策略之一。由於《類事》的撰作目的，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於故事所納含的命定觀念，且為了廣收事例為證，所以較原作有趨於簡化的現象。若原作為篇章簡短的志怪體或雜史、雜事性質的筆記體小說，由於篇幅較短，刪省幅度自然不大；至於「敘述宛轉，文辭華艷」的傳奇體，³⁸則見大幅度的修剪。《類

36 同註18，頁198-204。

37 通常敘述者以議論塑造價值和信念是逾越一般的觀念之上的，同註18，頁203。

38 此為依據李劍國的觀點，將唐代小說分為志怪體、筆記體和傳奇體三類。見《唐五代志怪

事》對原作故事的簡化主要是只取關於「命定」的主題，原作中不相干的敘事便被刪除；然而在敘述相關的事件時，又往往只展現具有推進情節作用的核心事件，而略去拓展核心事件的衛星事件；³⁹ 同時這些核心事件的敘述跨度，⁴⁰ 總是以把事件講述為敘事的敘說來傳達事件的「概述」，取代把事件摹擬成它們在故事時間中發生的實況來模仿事件的「場景」；⁴¹ 此外，在敘事的時間序列上，往往採取順時的敘述次序。⁴² 這一連串的敘述手法，皆可使故事簡省，更為直接地突顯主題，然這樣的敘事，在人物、情節、主題、氛圍等方面產生很大的影響。以下便分別就《類事》輕記事的敘事策略實際運作的過程，之於故事人物、情節、主題、氛圍等方面的影響作一論述。

1. 輕記事之於人物：角色的減少、人物形象的弱化、主人翁的易位

《類事》刪除無涉命定觀點的文本，致使故事情節趨簡，若從敘事功能上考量，人物的行動引發了事件，⁴³ 所以刪去事件，一定會造成人物的減損，而這減損包括由非常量化的人物數目的減少，和關乎作品深刻與否的人物形象弱化，還有由前兩項所衍伸出值得玩味的主人翁易位的情形。

(1) 角色的減少

刪略故事事件必然導致人物角色的減少，《類事》被省略的角色，其中

小說敘錄》前言。「敘述宛轉，文辭華豔」為魯迅對唐人傳奇敘述特色的描述。見《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頁 59。

39 於此所謂的「核心事件」和「衛星事件」是指在敘事中事件組合關係的結構，核心事件產生連續的或交替的事件的可能性，可稱為可能性事件，它們引發、增強或包含著某種不確定性，故而推進或概述一個由諸多轉化形成的序列。而衛星事件通過維持、推遲或延長由它們輔佐或圍繞的那些核心事件去擴張或填充某個序列的輪廓。由於核心是推進一個序列的行動關節點，它們就不可能被改動、打亂或替換而不從根本上改變那個序列。相反，衛星可以被省略、打亂或（被其他衛星）替換而不改動那個序列。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以「敘事的諸關節點」和「填充把連接功能分離開來的敘事空間的那些關節點」來區分二者。見史蒂文·科思（Steven Cohan）和琳達·夏爾斯（Linda M. Shires）著，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頁 58。

40 「跨度」是故事的時間長度為比照測定敘述時間的長度，同註 39，頁 95。

41 「概述」，即以敘說傳達事件，並不交代細節，就敘事時間而言，是把時間壓縮在敘述之中，從而使它短於事件實際發生的時間；「場景」，即以模擬事件發生的實況來呈現，使故事時間和敘事時間的跨度一致。同註 39，頁 96。

42 即故事序列的時間次序和敘述的時間次序之間是一致的，同註 39，頁 92。

43 同註 39，頁 75。

大部分是作為配角或襯角，展現一種性格類型的扁平人物，⁴⁴例如卷7〈崔圓為相〉⁴⁵主要記述李彥先夢崔圓審判己案事，以符全篇夢兆之旨，所以刪節原作甚多，其中最大的刪減為李彥允夢醒後語於夫人，李夫人勸李公善待崔圓，迨崔圓欲求職江南，李公具盛饌送行，崔圓銘感望報，夫人趁李公離坐，方道出彥允所夢，希望崔圓日後能在李公受難時，盡力相援，及李公至，復重言之。這些李公、李夫人與崔圓之間互動的細節，〈崔圓為相〉僅以「自是厚待之」為記，而居間的靈魂人物——李公夫人自然被剪裁掉了。卷16〈高氏陰配〉⁴⁶記述的目的在於劉長史女與高氏子的姻緣定數，故可死而復生完婚，自然對於劉長史女與高氏子交接的過程敘述甚略，僅逕言劉長史女來見高氏子，以更生為婚相託，並未提及婢女先來與高氏子諧好，再引見出劉小姐之事，致使原作中對於婢女、小姐的容色描寫和高氏子欣躍之情，以及高氏子與二女互動之細節，無由展現，這些情節的省略，自然也刪除了婢女的角色，而未見原作中劉女復活後，悲泣與婢訣別的情節。卷18〈鶴林花歸〉⁴⁷以記述鶴林寺杜鵑花的神異，如外國道人自天臺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於鶴林寺，和傳為花神的紅衣女子遊於花下，以及女子現身說出己為上玄司花女的身分，並預言此花將歸閬苑，故為殷文祥於重九開花，其餘相關人事一概不記，在原作中為數可觀的周寶與殷天祥的互動，全遭刪除，〈鶴林花歸〉中遂不見周寶之跡。

雖然上述故事中所省略的人物不是非有不可的故事主人翁，因為他們所涉及的事件從整個故事序列來看，大部分是屬於衛星事件，但卻有陪襯烘托主人翁或其他人物性格，和增加故事意涵的作用，例如〈崔圓為相〉原作中的李夫人較李彥允更能掌握崔圓未來宦達的先機，故比李彥允睿智；〈高氏陰配〉原作中出現劉長史女的婢女，則顯示了高氏子的輕狎好色，又因為劉長史女與婢女的互動，致使故事的意義尚涵蓋了二人之間的友誼。尤值得注意的是〈鶴林花歸〉中所刪省的人物周寶，在原作中他幾乎與殷天祥交揉而

44 見E.M.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1985)，頁59-61。

45 二本皆注出《唐逸史》，《太平廣記》卷148有載，題為〈崔圓〉。

46 二本皆注出《廣異志》，《太平廣記》卷386有載，題為〈劉長史女〉，注出《廣異記》，由此可知《廣異志》即為《廣異記》。

47 二本皆注出沈汾《續仙傳》，《太平廣記》卷52有載，題為〈殷天祥〉。

現，故事中除了述說殷天祥一生種種的神異經歷外，亦包含了周寶的仕宦生涯及其下場，他的出現不只是映襯出殷天祥的高明道術，而是具有相當的獨立性意義，可謂為僅次於殷天祥的要角。

此外，在《類事》中亦有將原作的主角化於無形的情形，例如卷 18〈李相紗籠〉⁴⁸所襲原作主角應為卜者胡蘆生，由《太平廣記》定題為〈胡蘆生〉已可窺得，原作主要敘述胡蘆生為眾人卜筮皆一一兌現的神異，至於〈李相紗籠〉僅擇取有關宰相李藩之事記述，因側重李藩命定為相事，所以大幅刪去原作中李藩與崔氏兄弟攜酒賚錢詣見胡蘆生的情景，同時對於胡蘆生、高員外和新羅僧言李藩為紗籠中人事，隻字未提，僅以「李藩丞相，方未第時，有人告曰：『公是紗籠中人。』」就將一切繁複的戲劇化敘述交代過去，於是在原作中位居主角的胡蘆生便於〈李相紗籠〉中完全消失。

(2) 人物形象的弱化

從前述而觀，故事人物角色的減少，已間接地弱化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形象，但事件本身的刪略，更是直接對人物形象的削弱，例如卷 16〈仙客遭變〉⁴⁹一則中，強調的是仙客和無雙的姻緣前定，所以僅交代兩人人人生契關的重要事件，原作〈無雙傳〉中的情節被大量刪除，致使仙客、無雙、塞鴻和古洪等人物無法充分展現其人格特質。情節的大量刪削對於人物影響最為鮮明的是仙客和無雙的深情形象，例如仙客村居襄陽後，復入京打探舅氏消息，原作中安排仙客入京巧逢蒼頭塞鴻，並由塞鴻口中得知無雙一家的境遇，當他聞知無雙已歸掖庭，竟「哀冤號絕，感動鄰里」，⁵⁰此為〈仙客遭變〉所未見；甚至原作中尚敘述當仙客知道無雙的婢女採蘋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說出「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之語，適為愛屋及烏心態的表現，其所蘊藏的深情令人動容；爾後仙客聞知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將宿於一己所掌理的長樂驛，遂令塞鴻假為驛吏，探詢是否無雙在內，塞鴻遂烹茗於內家所居之簾外，並遵守仙客「堅守茗具，無暫捨去」的囑

48 二本皆注出《原化記》，《太平廣記》卷 77〈胡蘆生〉一則，亦注出《原化記》。其中即有關李藩（當作「藩」）事，今《逸史》中亦載。

49 《十萬卷樓叢書》本未注出處，《四庫全書》本注出《秘閣閒談》，《太平廣記》卷 486 有載，題為〈無雙傳〉，亦未注出處。

50 本篇所引為李蕭點注，〈無雙傳〉，《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 4031-4035，以下引文則不贅注。

咐，夜深，猶不敢寐，果得無雙與語，而後仙客得塞鴻疾報，復假作理橋官與無雙匆匆一見，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閱覽無雙所遺之書，則「茹恨涕下」；從無雙信中得知富平縣古押衛為人間有心人，仙客竟然請解驛務，歸回富平縣尹的本職，為的就是要尋訪古押衛，謁見古生後，凡「生所願，必力致之，繪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而仙客如此一年未開口，至古洪詰問，方泣拜說出原委；當以為無雙真被處死時，號哭大嘆，流涕歔噓，不能自己。然於〈仙客遭變〉中，這些突顯出仙客心繫無雙，幾乎以她作為生命的意義，一次次的真情顯露的敘述，全被刪略了。至於無雙的情意，原作中主要展現在與仙客的重逢中，即於宿於驛站之夜仙客與塞鴻隔簾相語，詢問仙客是否無恙，同時請塞鴻傳書與仙客，信中「詞理哀切，敘述周盡」；然最能彰顯無雙深情者，是無雙與塞鴻隔簾勿言數語之後，塞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為何在片刻之間，無雙便身體不適若此，除了突受刺激的心理因素使然，實別無他解，由此可見無雙對於仙客的感情和面臨兩人被迫睽違內心所生的悲痛；至後，古生用計救出無雙，當無雙見到仙客，竟是「哭一聲遂絕」，應是基於同樣的情愫使然；此外，原作中敘述在事先並無任何約定的情況下，無雙經過滑橋，開車簾以視仙客，此舉完全顯示無雙對仙客未嘗或忘。這些藉由無雙的舉措輾轉地表達她內心的情感，可說是甚為高明的精彩敘述，卻未見於〈仙客遭變〉。〈仙客遭變〉在大幅的刪略下，原作深富情致的重逢情節，都簡化成乾枯的直述之句：「忽中使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無雙預其數，過驛留書與仙客」，自然無法塑造塞鴻的忠心和仙客、無雙的深情形象。至若古洪助仙客事，〈仙客遭變〉直書其事，未似原作將古生知恩圖報的義氣，和利用茅山道士藥丸謀救無雙的巧智，以及斷首塞鴻和自我了斷的果敢，盡現於扣人心弦的情節布置之中。這些主要訴諸古生言行，敘述詳盡的情節既被刪略，古生的「有心」，便無法在粗疏的略述中淋漓展現，是故原作中古生穎異神奇、至情至性等俠義之人格特質，便在改寫中抹煞了。〈仙客遭變〉對於原作〈無雙傳〉的情節多所刪改，致使故事中主角人物仙客、無雙情意真摯的形象，和次要人物的人格類型，如塞鴻的忠肝，古洪的義膽，變得模糊難辨。

除此之外，《類事》亦出現將多次發生的同一核心事件，刪減為一次，導致人物形象的削弱，因為小說情節不斷重覆往往能突顯人物性格或情感特

色，⁵¹ 例如卷 12〈德裕食羊〉⁵² 將原作中李德裕二度問僧人休咎的詳細過程簡化，如僧人結壇設佛像，居中三日，預言李德裕將南行，德裕怒叱，復使僧觀之，僧又結壇三日，仍告德裕不旬日必將南行，德裕心中不樂，便要求僧證明所言不妄，僧人以地下有石函為證，德裕才稍稍相信僧人，遂問自己是否能北還，僧答以「當還」的曲折繁複的過程，化約為「僧結壇作佛事觀之，曰：『當還。』」便無法彰顯李德裕對一己未來關切的恐懼心理和僧人超凡的神異形象，但其敘事目的在於僧人預言德裕生平當食千羊之事的應驗，所以這樣的刪略，並無損於烘托卜兆靈驗之旨。

由以上所述可知情節安排上詳略的差異，造成了人物形象鮮明清晰或模糊難辨的不同，尤其在《類事》只關切事件接續發展主軸的情況下，對於許多岔出去的其他衛星事件或造成敘事時間停頓的描寫，⁵³ 必定是略而不述的，而這些細節正是展現人物性格的載體，⁵⁴ 例如前述〈仙客遭變〉的故事中，將原作〈無雙傳〉中許多描寫仙客情緒的敘述刪去，〈德裕食羊〉亦將原作〈李德裕〉細緻地描寫出德裕面臨預言事件情緒反應，如「公大怒」、「公益不樂」、「公慘然而嘆」、「公大驚」、「公戚然不悅」⁵⁵ 略去不寫。

《類事》爲了速捷地表達題旨，對於無關乎命定觀點的細節描寫，往往付之闕如，是故此書在記事部分遭受壓縮，而造成缺乏細節描寫的敘述特色下，對於人物心理的描寫幾乎可說是完全忽略，遑論那些透過言行動作來完成的心理狀態呈現，例如《德裕食羊》中李德裕欲不食振武節度使所饋之羊，以避免南行不還之厄運，此最能顯現德裕害怕心理的部分竟被省去。卷 7〈竇參平臂〉⁵⁶ 刪略原作中竇參夢德宗贈錦半臂，夢醒後自解其夢的種種言行，卻逕述解者之言，可見只重視夢徵和結果，完全忽略了主人翁遭逢異夢

51 見王克儉著，《小說創作隱性邏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 137。

52 二本皆注出《宣室志》，今見《宣室志》卷 9，《太平廣記》卷 98 有載，題爲〈李德裕〉。又《太平廣記》卷 156〈李德裕〉亦載此事，大抵與卷 98 所載相同，不過注出《補錄記傳》。

53 停頓是敘事時間超過故事時間，發生在敘述時間繼續而故事時間停止的文本的某一個關節點，包括對人物的描寫，見《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頁 97。

54 同註 51，頁 173。

55 見蕭逸校點，《宣室志》，《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 1063-1064。

56 二本皆注出《宣室志》，今輯本《宣室志》未載，但見載《太平廣記》卷 278，題作〈竇參〉，注出《宣室志》。

的忐忑心理。卷11〈庭芝貸死〉⁵⁷中刪去了寶應年中竇庭芝司洛邑，敬事卜者胡蘆生，而生每言吉凶皆中，遂與竇家往來頻繁，甚得長幼敬仰，作為背景的故事鋪墊部分，逕以「竇庭芝與卜者胡蘆先生相善」交代兩人的關係，接著便直接引述胡蘆生告訴竇庭芝將有大禍發生的話，完全略去原作「一旦凌晨入門，頗甚嗟惋，庭芝問之，良久乃言。」⁵⁸此一生動描寫胡蘆生心情的敘述，胡蘆生「良久乃言」的舉措，正突顯了胡蘆生的不忍之情，適與前述胡蘆生與竇家有深厚的情誼相應，一旦這一段敘述因與占卜的主旨無關而被簡化，自然便會刪除胡蘆生呈現內心情感的刻劃。從以上實例舉證，說明了故事細節描寫的省略，必然導致人物形象的弱化。

(3) 主人翁的易位

《類事》刪略原作的情節，也導致了故事主人翁易位的情形。由於《類事》欲突顯命定主旨，因而選擇性地載錄事件，致使原作中形象突出的主人翁，由於情節的被刪減而趨於弱化，流向邊緣的位置，而原本並非主角的人物，卻因事件的集中記述，而成為故事的中樞，於是故事主人翁便巧妙地變化了。例如卷3〈懶殘撥芋〉⁵⁹大幅刪削原作中對懶殘的敘述，包括原作一開始敘述懶殘夜宿群牛之下，曾無倦色，達二十年的異舉，同時將李泌聽其中宵梵唱，判知懶殘為異人，以及李泌潛往拜謁，懶殘大詬，李公愈加敬謹，懶殘撥牛糞火出芋大啖，良久才請李泌席地而坐等情節；又刪去懶殘不假人力，使十牛和數百人都無法移動的攔路大石，轉至山下，山路因之復通，一掃他人視為狂人的訕笑，搏得了眾僧的羅拜，全郡之人稱懶殘為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卻悄然而懷去意；和懶殘為寺驅逐虎豹，為虎銜去，而致虎豹絕跡事。而這些適足以展現懶殘「傳奇性」的敘述，皆不為〈懶殘撥芋〉所取，〈懶殘撥芋〉只著重於李泌因異之徑見，懶殘撥火出芋，取其半以授李泌，言其將為相十年，泌後果相肅宗十年的記事，強調李泌為相實為前定，故雖名為「懶殘撥芋」，但故事的主體在李泌而非懶殘，僅假借懶殘之口說出李泌將為相十年，與《甘澤謠》將懶殘的超凡形象描繪地栩栩如生、令人稱奇，大異其趣，可見其目的仍在於窮達之命定，懶殘終究只成為顯示此

57 二本皆注出《劇談》，今見《劇談錄》卷上。

58 見蕭逸校點，《劇談錄》，《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1465。

59 二本皆注出《甘澤謠》，《太平廣記》卷96有載，題為〈懶殘〉。

命定思維的工具性人物。

又如卷2〈佐卿留箭〉⁶⁰的原作是以徐佐卿為敘述主體，非常強調他的神異性，從以「風局清古」⁶¹勾勒他清逸脫俗的容貌，又描述他一歲率三、四次至明月觀，耆舊虛正堂以待的禮遇，為道流所傾仰的情形，並形容他此番前來「神爽不怡」，暗示出中箭的景況，後藉由佐卿自言「尋已無恙」，表示已得痊癒，這些足以鏤刻徐佐卿形象的敘述，〈佐卿留箭〉皆將之刪略；又關於玄宗入蜀的部分，〈徐佐卿〉詳述了玄宗得此箭的過程，還特別指明「佐卿蓋中箭孤鶴耳」，仍以佐卿為主體，不似〈佐卿留箭〉僅保留「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此。」較為曖昧的敘述；最為關鍵的是，二篇結尾的分歧，同樣描述玄宗面對此一異事，〈徐佐卿〉為「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佐卿留箭〉則是「上大奇之，因歎其幸蜀之兆已定於此。」前者側重在事件之異，遂以「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遇佐卿者矣」結束全文，再次突顯了佐卿的神祕色彩，完成了故事的傳奇性，也可使讀者感受到故事的主人翁是徐佐卿。但後者則強調了唐玄宗避亂於蜀為一定數，明皇射鶴致佐卿留箭是為一預示的徵兆，結尾則是編撰者所加的註腳：「其事與一行『當歸』及『萬里』之讖相符合焉。」〈一行當歸〉與〈萬里之讖〉皆見於《類事》的卷2，二則故事所述都是玄宗幸蜀的符應徵兆，在此並提，有烘托作用，共同強調出玄宗幸蜀的命定主題，故事主人翁亦由傳奇人物許佐卿轉換為命定人物唐玄宗了。

由以上所舉出的兩個例子，可知《類事》在事件記述上與原作的歧異，巧妙地將主人翁易位了，最極致的表現，如前述〈李藩紗籠〉故事因為對原作選擇性記述，致使被胡蘆生相命的李藩變為主人翁，原作的主人翁胡蘆生卻不再存在於故事之中。

《類事》為了達到撰作的目的，縮減了記事的篇幅，於是原本篇幅透迤的唐五代小說，在敘事框架受到限制的情況下，故事中人物的數量和性格特色，以及在故事中的角色扮演，都有了顯著的變化。

60 二本皆注出《集異記》，見於今輯本卷1。《太平廣記》卷36有〈徐佐卿〉一則，注出《廣德神異錄》。

61 本篇所引為劉登閣點注，《集異記》，《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2783。以下引文則不贅注。

2. 輕記事之於情節：有機結構的斷裂、懸念技巧運用的缺乏

至於《類事》輕記事的敘述策略之於情節上的影響，基本上就是導致情節的簡化，最主要表現在情節有機結構的斷裂和情節懸念技巧運用的缺乏兩方面。

(1) 情節有機結構的斷裂

《類事》簡省記事導致情節有機結構的斷裂，特別能從與原作的比較中顯現出來，《類事》爲了簡明的點出故事關涉命定思維的記事，往往將一些影響故事發展的因子⁶²刪去，致使所述事件失掉了前因，例如卷 5〈韓澈靈語〉⁶³中所要強調的是契苾鏐的鬼魂預言宇文覲和辛稷的仕祿壽考，未載記原作〈宇文覲〉中佐史貪錢，未依韓徹之命，以新棺斂葬於令廳地下所挖掘出的髒骨，而以小書函折骨埋葬，至舍竟倉卒欲死，韓徹得其家人來報，派巫者察視，而巫者遂於韓徹之前作靈語，說出骸骨之身分，這一具有驚異效果的引人情節，只能在「因令收之，以新棺殮葬諸野」之後，接上「後靈語云」開啓下文，既突兀、又與之前的情節未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因果有機結構，同時因刪略了有關巫者的情節，所以將原作中巫者作靈語轉爲韓澈靈語。

又如卷 3〈寶藏三品〉⁶⁴ 著重僧人預言張寶藏將官登三品的異兆，記事較之原作相形簡略，因而造成在敘事中兩個情節因果的斷裂，如〈寶藏三品〉逕言張寶藏下直而有年七十未嘗食酒肉之嘆，但在原作中有一個前因，即寶藏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方倚樹而嘆，因爲〈寶藏三品〉省略張寶藏見少年食肉之事，致使他的感天而歎，失去了前因，不能以一個具體的情境來烘托他的窘狀，而僅能成爲一個概述；又〈寶藏三品〉直接記述張寶藏具述進方，以治太宗氣痢之疾，而原作則述及太宗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當加重賞之事，致使後寶藏封官，前有所因，即〈寶藏三品〉省略唐太宗問左右有無治病疾之方的記述，故使張寶藏進方之舉，前無所據，不似原作有因有果，情節因之能緊密結合。

62 美國的小說理論家 William Kenney 認爲優秀的小說往往在故事開始的情境提供一些顯性或隱性的不穩定因子，以便故事的發展。詳見氏著，陳迺臣譯，《小說的分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頁 11-14。

63 二本皆注出《廣異記》，《太平廣記》卷 336 有載，題作〈宇文覲〉。

64 二本皆注出《蜀異志》，《太平廣記》卷 146 亦載此事，題爲〈張寶藏〉，注出《獨異志》，李劍國認爲此事所記非發生於蜀中，故應出自《獨異志》，同註 11，頁 777。

此外，如前述〈仙客遭變〉中略去了仙客與無雙幼年相狎，和仙客依附舅氏窺見無雙美貌等情節，而使仙客之深情所發，一無所依。還有〈德裕食羊〉刪除原作故事中李德裕提問的背景，使僧人「當還」的回答令人覺得突兀、不解，又為一明顯的情節斷裂的實例。

(2) 懸念技巧運用的缺乏

《類事》敘述形式著實非常制式化，不似其所承襲原作有較多的變化，例如卷7〈孫偃踐木〉，⁶⁵ 原作在敘述次序上採補敘之法，先敘孫龍光偃狀元及第，再提及前一年夢踐履數百積木上事，請李處士釋夢，處士認為此夢為居眾材之上的象徵，則預言孫偃來年必中狀元；但〈孫偃踐木〉則將之轉化為一順時的概述，並刪去李處士的角色，由孫偃自己釋夢預言，後果為狀元。原作中先敘述結果，再說明原因，製造出懸念的效果，同時請李處士釋夢，亦較一己自謂必為狀元饒富意味可尋，畢竟請人釋夢，顯示主人翁對此夢所預示的吉凶無由把握，這樣的狐疑不定的心態，必然會渲染至讀者，引發讀者的好奇，亦欲一探究竟，達到良好的敘事效果，而〈孫偃踐木〉目的僅在於陳述出孫偃夢兆的靈驗，故反其道而行，將原作改寫為一平淡無奇的順時概述，而這種樸實的記述最為明顯地便是將原作中精彩的懸念手法，完全泯除了。

又〈仙客遭變〉原作〈無雙傳〉敘述古洪幫助仙客奪回無雙的過程，亦是充滿了懸念，先是半年都沒有任何消息，突然一日古生來書，說有茅山使者回，要仙客來家，但見到仙客，古生未發一語，仙客便詢問茅山使者，古生竟答以「殺卻也，且吃茶」，直至夜深，古生便問仙客宅中是否有女家人認識無雙，仙客即刻召採蘋來，古生端詳採蘋的相貌，且笑且喜的對仙客說，要借留採蘋三、五日，請仙客先回去。種種古生的言行舉措，充滿了神秘，令人費解，而生發出疑惑，為什麼茅山使者回，古生要找仙客來，仙客來了之後，為什麼沒見到使者？詢問古生，卻得到已殺使者的回答，為什麼古生要殺使者呢？又為什麼古生需要一熟識無雙的女家人？為什麼採蘋來了之後，古生非常高興？同時要求要留下採蘋三、五天？這一連串的問題必然會隨情節發展接踵而至，然此種種疑惑猶未解開，幾天後，仙客竟聽聞無雙被

65 〈孫偃踐木〉二本皆注出《摭言》，今見《唐摭言》卷8〈夢〉。原作中「孫偃」作「孫龍光偃」。

處死的消息，不禁痛哭失聲，原本寄寓古生的希望，至此破滅，沒想到當晚，古生攜無雙至，方道出營救無雙的始末，之前的疑惑也因之而解。〈仙客遭變〉對於原作此處數度運用懸念手法精彩的情境再現，完全化為簡單的概述，而未造成扣人心弦的效果。

而〈李相紗籠〉未記載原作中胡蘆生和高員外預卜李藩為相之事，因此無法形成故事的懸念效果，即李藩漂寓東洛時，與所依托的崔氏兄弟往見胡蘆生，胡蘆生已半酣箕踞於蒲團，見先至的崔氏兄弟，不為之起，但伸手請坐而已，卻命小童掃地，因為有貴人要來，見李藩才至級下，便起身笑迎，執手而入，且告訴李藩在兩紗籠間，不必擔心目前的困厄，李藩詢問紗籠的事，胡蘆生終不復言，留下紗籠的疑團；又李藩往揚州，素與李藩相善的高員外夢陰吏告知李藩為紗籠中人，高員外詰問究竟，陰吏卻不肯言，李藩遂心異此紗籠之說，而此紗籠之謎，一直到張建封鎖徐州，李藩為巡官校書郎，新羅僧相李藩為紗籠中人，才說出紗籠中之意，即「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得也。」⁶⁶原來紗籠中人指的是宰相，至此李藩方悟蘆生、高公所言，而後果為相。如此一頗具戲劇張力的敘述，竟被〈李相紗籠〉簡化為有人告訴李藩「公是紗籠中人」，然後說出「冥司凡臺相則立其象，以紗籠護之」而已，這樣的簡略的敘事，自然不具隨時間開展形成強烈的懸疑性，因而缺乏引人入勝的效果。

上述數例鮮明地標舉出《類事》著重於所列舉的故事能否清楚地傳遞出命數前定的觀點，對於故事因果的內在結構便相形忽略，致使故事成為僅具例證性質的簡略記事。

3. 輕記事之於主題：意義圖象的縮減和單一化

《類事》轉變了唐五代小說的敘事內容，事實上就是改變了釋放故事意涵的圖象，⁶⁷主題意義自然便跟著改變。在前一節探討《類事》運用議論直接表述故事意旨時，已見多則在結尾部分以命定觀點的議論取代記事，或取代原作撰者欲證其事為真的評述的情形，例如〈正己看牆〉、〈韓澈靈語〉、

66 見王公偉點注，《原化記》，《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頁3756。

67 William Kenney將關涉小說主題最重要的作者對經驗的整體反應稱為圖象。同註62，頁132-133。

〈張生得官〉、〈敬達玉琬〉、〈崔曙一星〉、〈固言遇老〉等故事。至於前述〈佐卿留箭〉將原作結尾所突顯道士的神異色彩轉變為帝王的命定之讖；〈仙客遭變〉將原作最後一句「何其異哉」改為「豈非前定乎」，於是對於仙客和無雙間種種離合悲歡的際遇，原以人間傳奇異事評價之的角度，轉變為姻緣前定觀，將原作許多精彩生命發揮至極的「人力」歸於「天命」，此二則故事雖不見特別明顯的議論，但亦可與上列諸故事同觀，皆是編撰者在結尾巧妙地改易，因而導出與原作完全不同的意涵，卻將採摭於各個著作的唐五代小說，一致歸趨於命定的思維，致使編撰者的意圖顯而易見。

除了在文本之結尾作關鍵性的改寫，竟使故事意涵完全歸趨於命運前定的觀點外，《分門古今類事》中亦選擇性記述事件，造成因刪略情節致使故事意義窄化的情形，這些故事僅藉由擇取關涉命定思維的情節敘述，也造成故事主題的移轉，典型的例子為〈懶殘撥芋〉完全不敘述原作中懶殘頗具傳奇性的事蹟，僅記述懶殘預言李泌十年後為相，果得驗證事。

又如卷 16〈李生筮篋〉⁶⁸將原作中號為「二舅」的盧生和李生共同讀書修道於太白山的關係改為僅盧生修道，且為李生的舅舅，同時刪略原作中李生不堪修道之苦，闖蕩於江湖，欠折官錢數萬貫，甚為失意，而後兩人相逢，李生因見盧生衣著襤褸竟哀憐之，卻遭盧生叱罵，於是邀請李生至所居處，李生至則才發現盧生星冠霞帔，容貌光澤，居於似仙境之所的敘述，僅以「別久忽相遇，邀李詣其居」帶過；又關於李生於盧生庭園見筮篋女、復娶陸長源女等事，也較原作簡略；甚至完全刪去盧生予李生拄杖為信至波斯店取二萬貫，以還官錢之事，以及李生驚異於陸長源女所云夢中至盧生庭園的經歷，而欲再尋盧生之居，至則見荒蕪一片，不復見當時飲酌的北亭的敘述。〈李生筮篋〉記述的焦點全集中於李生和陸長源女的姻緣，如此一來〈李生筮篋〉將原作神仙思維淡化，卻突顯了夢兆之異，而無法似原作般可以兼含兩者。

而卷 18〈顏濬廢閣〉⁶⁹僅記原作中顏濬與陳宮人同遊瓦棺（官）寺，且預言寺之高閣將毀，數月後果符所言；將原作中顏濬、隋煬帝宮女於船中邂

68 二本皆注出《唐逸史》，《太平廣記》卷 17 有載，題為〈盧李二生〉。

69 《十萬卷樓叢書》本注出《傳奇》，《四庫全書》本注出《蜀異志》，《太平廣記》卷 350 有引，注出《傳奇》。

迺，復約遊瓦官閣，得見陳朝張貴妃、孔貴嬪等宮人，言史飲酒、題詩歡會的浪漫事蹟全數刪除，故其中所寄寓的歷史興衰之感，人鬼睽違的憾恨之情，自然無從展現。

又卷5〈德璘巴陵〉⁷⁰原作〈鄭德璘〉的故事圖象所釋放出的意義，包括洞庭府君的神異，他白髮而有少容，與德璘言多玄解之語，以菱芡為食等等，甚而對鄭德璘贈松醪春表現出不甚媿荷，因為預知將有所答報，後果救鄭德璘所鍾情的韋氏女，並預言德璘將為巴陵令，進而使韋氏至水府見父母事等等，都突顯了老叟和其所為之事的奇異；故事亦以江中秀才詩的巧合增添故事的傳奇性；同時全篇敘述了德璘與老叟互動，韋氏女與鄰舟女的往來，鄭德璘與韋氏的邂逅、睽別和重逢，及韋氏女至水府見溺斃的父母，盡現人間諸情，〈德璘巴陵〉只集中記載鄭德璘、韋氏和洞庭府君之間的關係，主要烘托出鄭德璘作巴陵令的異兆。

由上述故事可知由於編撰者自覺的改易，將故事的意涵導向命定的思維。事件的刪減已造成意義圖象的縮小，再加上編撰者對主題的強烈主導，致使唐五代小說中原本可能和命定思維較為無涉的作品，也沾染了命定的色彩，而著重於故事中的人、事、物的神異，同時還從中輻射出神仙道教的信仰，以及親情、友情、愛情種種情誼的豐富意涵，都被《類事》給扼殺了。

4. 輕記事之於氛圍：情境的渲染不足

故事情境氛圍是通過環境描繪而渲染的氣氛和情調，通常是由景、物、場面（人）等構成，所以氛圍的形塑一般也以景物、人物為支點來表現，⁷¹《類事》因為注重記事所含藏的命定觀，所以在敘述故事時，只擇取一個大要，以之作為命數前定的例證，在此前提下，原作情節大幅被刪削，對於客觀再現環境的描寫已付之闕如，遑論以環境映襯人的精神情狀，例如〈徐佐卿〉中非常細緻地描述被玄宗御箭所射中鶴的行徑：「其鶴則帶箭徐墜，將

70 《十萬卷樓叢書》本注出《靈異傳奇》，《四庫全書》本注出《靈異傳》，其書不詳，但《太平廣記》卷152有載，注出〈德璘傳〉，並言《類說》卷32引作出《傳奇》，又《紺珠集》、《綠窗新話》皆有節本，且皆注出《傳奇》。李劍國先生認為《靈異傳奇》即《傳奇》，《廣記》注出〈德璘傳〉，蓋唐宋時嘗單行，實出於裴鏞之《傳奇》，同註11，頁579。

71 同註51，頁253。

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眾極目，良久乃滅。」具體地刻劃出鶴中箭後的反應，以及帶動出眾人的視線流動，展現出一幅奇異景像，十分引人。但〈佐卿留箭〉僅以一句「鶴帶箭西南而逝」帶過，不具任何具象效果；此外對於道觀，〈徐佐卿〉有烘托情境的描寫：「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佐卿留箭〉雖然賦予了道觀「明月」之名，卻刪去原作對於「明月觀」清幽環境的描寫，同時對於徐佐卿在明月觀活動的景況亦加刪除，致使原作藉由明月觀和徐佐卿的描寫，所構設出一種超於塵俗的氛圍，便無從展現。〈德璘巴陵〉的原作以德璘驚惋的神情和兩首抒情的哀弔詩——「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沈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共同烘托出鄭德璘對韋氏女之死的一片哀情，〈德璘巴陵〉刪除了鄭德璘悲傷之情的描寫，且只保留後一首詩作，自然減損了故事哀傷的氣氛。此外，卷4〈楊瓘遷官〉⁷²的原作以楊瓘與老宰的互動，和老宰作法的種種禁忌，渲染出一股神秘懾人的氛圍。〈李生筮筮〉原作中描述盧生充盈名花異木仙境般之花園，而後李生再尋盧生所居，唯見荒草一片，不復睹亭臺，則營造出仙異的氛圍。〈仙客遭變〉原作中描寫仙客與無雙經由塞鴻得以以目光重會的場景，則頗使深情瀟灑。而〈顏濬廢閣〉原作亦以顏濬與歷代佳人詩酒歡會塑造出浪漫氛圍。〈鶴林花歸〉原作中敘述鶴林寺杜鵑盛開至花逸，最終鶴林寺犯兵火，寺焚，樹失根株，還歸閨苑，而周寶忽俎，天祥莫知所終，點染出一種仙凡／生死／繁華沒落的二元對立的氛圍。而上述種種情景交融的情境卻在《類事》中缺席了。

「氛圍」不但是一種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更是小說文本風格形式的重要原因，⁷³《類事》人物形象的弱化，在此又覓得了影響因素，而《類事》未著意於氛圍的經營，自然使原本形象鮮明的文本逐漸面貌模糊，進而缺乏渲染的力量。

《類事》輕記事的敘事策略，在人物上，產生人物角色的減少，人物形象的弱化（尤其全書幾乎不處理人物心理的部分）和故事主人翁的易位；在情節上，造成情節有機結構的斷裂，情節懸念性的缺乏；在主題上，致使故事

72 二本皆注出韋絢《戎幕閒談》，《太平廣記》卷304有載，題作〈暢瓘〉。

73 同註71。

意義趨於窄化和單一；在故事的氛圍上，導致情境渲染的不足。《類事》以這樣的敘事特質，將事件陳述給讀者，就讀者的反應而言，能喚起情感反應的人物形象和氛圍情境皆付之闕如，致使同情共感的閱讀體驗不復存在，而可攫獲讀者好奇的懸念手法，以及頗具挑戰性的多元意義圖象的消弭，亦淺化了讀者的介入，故事已然成爲一種觀念的樣本範例，閱讀的意義彷彿只在於尋索一個觀念，然而這個尋索是輕而易舉而不具任何挑戰性，事實上文本沒有留下空間，讓讀者能夠賦予故事意義。

（三）爲標示改易和期使情節合理化的措意

在討論了《類事》爲了突顯全書命定的旨意，所採取重議論輕記事的敘述策略，致使其所擇取的唐五代故事的敘述面貌和意涵，大多因之幡然改易，而與原作有了截然不同的敘述效果之後，本篇亦欲針對此書同時亦留心於與原作區別和致使情節更爲合理的特別措意之處，作一探討。

縱然依據前一節的探討得知《類事》有許多敘事效果上的缺陷，尤其刪節原作不免產生一些忽略情節因果結構的情形，但非常弔詭的是，《類事》在改寫唐五代小說時，亦展現了避免敘事邏輯謬誤的理性思維，大都能井然的概述一個故事。針對敘事本身而言，《類事》在敘事的美學效果上是一種退化的表現，也顯示出其著力點並非在故事的本身，而是以記事作爲其所欲彰顯的分門主題，以作爲全書「命定」主旨的一員。但《類事》並非是一味的抄襲與採取非常制式的刪改，是故它承襲唐五代小說加以再敘述的「新」，可以從另一個層面來觀察，首先是《類事》的編撰者運用了數種也許看來較爲膚淺的障眼法，即是：

1. 人物姓名的改易：例如卷2〈天后知命〉⁷⁴將「素娥」改爲「綺娘」，〈楊瓘當官〉將「暢瓘」改爲「楊瓘」，〈韓澈靈語〉將「韓徹」作「韓澈」，〈崔圓爲相〉將「李彥允」改爲「李彥先」，卷9〈馮婁共見〉⁷⁵將「張罔藏」作「張同藏」，卷11〈處謙星算〉⁷⁶將「趙匡明」改爲「趙巨明」，卷15〈全

74 二本皆注出《甘澤謠》，即《甘澤謠》中〈素娥〉故事，《太平廣記》卷361有載。

75 二本皆注出《朝野僉載》，《太平廣記》卷146有載，題爲〈婁師德〉，亦注出《朝野僉載》，然今本《朝野僉載》未載此事。

76 二本皆注出《瑣言》，《太平廣記》卷215有載，題作〈馬處謙〉，亦注出《北夢瑣言》，今本《北夢瑣言》未載此事。

忠生蘆」⁷⁷將「蒲洪」改爲「符洪」、「李匡威」改爲「李正威」，〈鶴林花歸〉將「殷天祥」改爲「殷文祥」等。⁷⁸

2. 時間上年月的變更：例如卷2〈叱像占年〉⁷⁹將原作玄宗在位之年由五十載改爲四十八，〈韓澈靈語〉將宇文觀死期由「爲官後四日」改爲「爲官後四月」，〈鶴林花歸〉將原作殷文祥前二日住宿鶴林寺改爲前一日，卷10〈東之奇才〉⁸⁰將張東之的年歲由「六十三」改爲「六十二」，卷16〈閑儀繼室〉⁸¹將閑儀「九歲」遊於花欄改爲「十九歲」，卷15〈子良雙虹〉⁸²李錡兵反之時改「是年九月」爲「是月九日」，〈高氏陰配〉將劉長史長女病卒之年由「十二歲」改爲「十七歲」，卷19〈和璞斲牆〉⁸³中將原作崔司馬「病積年」確定爲「病七年」等。

3. 空間地點方位的移轉：如卷1〈煬帝縱魚〉⁸⁴省略獲鯉的確切地點，又將煬帝放生的地點由北海改至池中；〈奚陟推案〉中奚陟爲主人座位爲「東面首坐」改爲「西面首座」，奚陟揖客之始由「西面」改爲「西南面」等。

4. 名物數目的增減：如卷11〈道茂請判〉⁸⁵敘述桑道茂埋鐵柏樹下，

77 二本皆注出《北夢瑣言》，今《北夢瑣言》卷13有載。

78 雖然這其中幾則故事人名的改易，暢→楊，徹→澈，允→先，罔→同，匡→正，天→文，有可能是後人傳抄所造成的形近之誤，但由《類事》其他在時間、空間和名物數目上皆著手改易的情形下，很難單一的視人名的改動爲傳抄之誤。

79 卷2〈叱像占年〉二本皆注出《宣室志》，今見《宣室志》補遺，《太平廣記》卷136有載，題作〈叱金像〉。

80 二本皆注出《定命錄》，《太平廣記》卷221有載，題爲〈張東之〉。

81 注出《續玄怪錄》，今本未見載，《太平廣記》卷159有載，題爲〈琴臺子〉，故王公偉點注《續玄怪錄》，收錄於《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將之附於補遺部分。

82 《十萬卷樓叢書》本注出《祥異集驗》，《四庫全書》本注出《祥異集》，殆爲《祥異集驗》，《太平廣記》卷137有載，題爲〈張子良〉。

83 二本皆注出《西陽雜俎》，實見載於《西陽雜俎》〈壺史〉邢和璞一則。

84 二本皆注出《闕史》，今本《闕史》則未見，〈隋煬帝海山記〉則載有此事。若李劍國力主〈隋煬帝海山記〉爲晚唐人所作爲是，同註11，頁895。則此則可界定爲出於〈隋煬帝海山記〉。

85 《十萬卷樓叢書》本注出《劇談閒話錄》，《四庫全書》本注出《閒話錄》，《太平廣記》卷76有載此事，題爲〈桑道茂〉，亦注出《劇談錄》，今見於蕭逸校點，《劇談錄》，《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之逸文。

將原作「一大柏樹」改爲「二柏」；〈德裕食羊〉將李德裕生平食羊之數，由「一萬」改爲「一千」，已食之數由「九千五百」改爲「未盡五百」，振武節度使的贈羊數目由「五百」改爲「四百」；卷13〈適之鼎鬥〉⁸⁶將李林甫宅之二大鼠改爲一大鼠。

上述的這些手法造成《類事》與原作的差異，形成了一種區隔，而可避免抄襲之嫌，完全出於編撰者有意識的運作。但這並不是《類事》所獨有的單一現象，南宋小說《鬼董》在承襲唐人之作時，亦在時代年月、人名地名上作了一些更易，⁸⁷殆宋人小說引用前人之作，必然會導致試圖在人物姓氏、時空定位上做一些變動。基本上這一層面的改變是比較無關乎敘述功能的，對事件的敘述影響不大，較不涉及意義建構的問題，因此大部分的故事無法由此展現出與原作敘事不同的意涵，僅具有編撰者主觀認定的避嫌功能，卻給予了讀者「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印象，甚而偶爾還有參差的情況，例如〈德裕食羊〉中，贈羊數目由「五百」改爲「四百」，便不盡符李德裕食千羊必死之讖。

但《類事》的編撰者在運用這樣的手法表現時，並非全然拙劣而毫無自覺的，事實上某些故事因爲這樣的改動，而有了意涵的差異，例如〈仙客遭變〉將原作〈無雙傳〉中仙客因兵亂與無雙失散村居襄陽的時間，由「三年」改爲「二十年」，接著又非常自覺地把兩人因古洪的幫助重新團圓的時間由「五十年」改爲「三十年」，使得故事發生時間大致不變，由此可見委心子並非率意爲之，在改動時能照顧前後文，姑不論這樣的改動是否符合朱泚之亂發生的歷史事實時間，但讀者卻可以感受到仙客對無雙的情感之深長，二十年後仍不減其初衷；當然村居的時間拉長，相形之下，便少了兩人重逢歡愛的時間，仙客村居襄陽時間的改易，還是造成了對故事意義的影響。又如卷2〈普王履位〉⁸⁸將狂尼登峻塔投身一死一傷的結果改爲二死，可算是一種變相的數字更改，是故〈普王履位〉可以刪去詰問受傷女尼、丞相焚泗州狀牒

86 二本皆注出《明皇雜錄》，今見《明皇雜錄》卷上。《太平廣記》卷362有載，分題爲〈李適之〉和〈李林甫〉二則記述。

87 同註1，頁374。

88 二本皆注出《唐闕史》，今見《唐闕史》卷下，《太平廣記》卷136有載，題作〈唐僖宗〉。

杖殺傷者的情節，若二女尼皆跳塔身亡，僅可說是她們出示了僖宗將即位的預言，但前者則牽扯出人事對權力的鞏固所作的干預之舉，此則對女尼死亡人數的改動，不但造成了敘述形式的改易，也形成了意涵的分歧。此二則敘事有關數字的改易，實展現了編撰者的撰作思維。

此外，《類事》也出現了編撰者對原作作更合理安排的情形，如〈固言遇姥〉中將《西陽雜俎》中記述老姥告知固言明年芙蓉鑑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後，所言「某此時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改為「願以季女為託」，因下文敘述二十年後李固言登庸，老姥復來拜謁，李公已忘前事，老姥便言「嘗囑季女者」，若作「願以季女為託」，則可使情節前後呼應，不致使「嘗囑季女者」前無所據。卷7〈張鷟乘驢〉⁸⁹的原作並未清楚說明張鷟夢五色鳳鳥的時間，僅敘述張鷟曾夢一五彩成文的大鳥，告訴了祖父，由祖父仍健在，可知張鷟作此夢應非年長之時，〈張鷟乘驢〉則明確定為「少時」，以強調其命中注定擅文采，宦達早已前定的特色。卷7〈裴頭黃尾〉⁹⁰將原作裴佶為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的「裴頭黃尾，三求六李」改為裴求為狀元，黃駕末名，三人名求，六人姓李之意，針對原文「六李」之疑，⁹¹把「六李」置入讖語之中，為六人姓李之意，將「六李」合理化，因此「三求」變成了三人名求，而非排名第三為李求。〈和璞斲牆〉於文末增添崔司馬一紀而終的記述，以證明邢和璞為崔司馬得延壽一紀之言不虛，不但與前文呼應，也強調了為善而增壽的觀點。又如〈道茂請判〉中將原作中李晟久居左賁之位，未得超遷，聞桑道茂善相，故齎絹一匹，專程拜訪桑道茂，當時桑道茂信者甚眾，造訪者多不能即見之，他得知李晟在門，卻親自迎接，隆禮而待，稍後說出將來託命之請，並請李晟帶回所贈絹匹，換得李晟的汗衫，於衿上書名為證；改為桑道茂齎一縑見李晟，請託未來救命之事，並以縑換取書寫「為賊脅迫」的衿衫作為信物，雖然所記與原作完全相反，但如此記

89 《十萬卷樓叢書》本注出《唐逸史》，《四庫全書》本注出《宣室志》，今《逸史》、《宣室志》皆未載，《太平廣記》卷277引此事，題作〈張鷟〉，注出《朝野僉載》，今見《朝野僉載》卷3。

90 二本皆注出《摭言》，今見《摭言》卷8〈陰注陽受〉。

91 「裴頭黃尾，三求六李」又作「裴頭黃尾，三求」六李。清蔣光煦校本此有「『李』疑應作『字』」之句，見《唐摭言》（臺北：世界書局，1975），頁830。

述便符合了「道茂請判」之名。⁹² 即將原作中「李晟請見桑道茂」改為「桑道茂請見李晟」以符合題目。由上述可以看出《類事》在刪節原作之餘，追求情節合理化的用心，以及為達全書宗旨的著意之處。

三、結 語

魯迅曾以「多講古事」⁹³ 來敘述宋代小說的特質，至於如何「講古事」則未有進一步的闡釋，根據李劍國整理宋代文言小說的結果，可知宋代已出現大量的引錄前人記事的撰作，其中不乏李先生所謂的具有專題性的小說類書性質的作品，可惜大部分皆已亡佚，難以窺得文本實貌。⁹⁴ 就今所存的作品而觀，宋人引述前代作品，有些則如同《太平廣記》的編纂，⁹⁵ 對於前人之作，基本上是照錄全文，如《鬼董》、《醉翁談錄》等，這些作品因為較為完整地保留原作，因此也留存了原作的敘事特色，其中亦可見編撰者的加工處，或在人、時、地等背景資料，或在表達形式上，有所增飾改動。所以這一類的作品即使有分類撰集的類書性質，但較具有小說敘事的美學效果，而

92 而〈道茂請判〉將李鵬事記於文末，適與〈桑道茂〉置於文首相反，且較簡略。李鵬見桑道茂事，亦見今《北夢瑣言》卷10。

93 見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收錄於《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331。

94 根據李劍國的整理，北宋的《通籍錄異》、《搜神總記》、《窮神記》、《科名定分錄》、《群書古鑑》、《勸善錄》（周明寂）、《勸善錄拾遺》、《唐宋科名定分錄》、《古今前定錄》、《歷代神異感應錄》、《勸善錄》（無名氏），以及南宋《勸戒別錄》、《夢兆錄》皆為專主一題，集古今之事以成，惜今多散佚。詳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中有關上述諸作品的敘錄部分。

95 《四庫全書》亦將《太平廣記》歸於小說家異聞之屬，《提要》並言：「古來軼聞瑣事，僻笈遺文咸在焉，卷帙輕者，往往全部收入，蓋小說家之淵海也。」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3冊，頁1。雖然《太平廣記》在彙錄原作時，有因主人翁相同或類似事件，將相關資料編排在一起，亦有刪落文字的情形。見王國良，〈談《太平廣記》——以文獻學為主的考察〉，《文獻與資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頁184、204。但大致上在收錄原作時，都不加刪節改動，儘量保留原作面貌，注意故事的完整性，所以《太平廣記》具有極高的輯佚和校勘價值。參見陳湘懷，〈論《太平廣記》的文學文獻價值〉，《撫州師專學報》1996.4: 48；李樂民，〈李昉的類書編纂思想及成就〉，《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5(2002): 116。

此美學效果主要是得自原作作者，僅極少部分應歸功於引用的編撰者。另一類採用前人之作的方式為刪略原作，例如《綠窗新話》、《樂善錄》、《類事》等，其中又多有減損原作記事，增加議論者，可見編撰者側重在以原作為事例，發抒全書宗旨，其雖多出以類書的形式，但充滿著編撰者的意識，然此類以前人之作為觀念服務的敘事，往往失卻了敘事的藝術性。從宋人文言小說引述前人之作的情形，可以尋索出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就是大量的分類引述前人之作，致使作品具有類書的性質，但或由於完整的保留原作，或由於加上了編撰者的作意，而使得這些作品不能輕易地歸於類書之列，尤其是在記事上多所琢磨，添加議論發抒主旨者，更能代表宋代文言小說的撰作意識，彰顯出宋代文言小說的風格特色。

本篇藉由《類事》改寫唐五代小說的敘事面貌，探討《類事》貫穿全書的重議論輕記事的敘事策略，以及改易時猶戮力於與原作區別和情節合理化的特別措意之處，充分突顯出《類事》的撰作意識，而此撰作意識正是《類事》超拔於類書群中，而置之小說之列的主要根由。《四庫全書》點出其「警發世俗意頗切至」是全書宗旨，本篇則從文本的敘事特色著手，更為具體的呈現《類事》如何達到此意圖的意義建構路徑，即在敘事中增附議論，甚而以議論取代記事，或經由記事本身的改易，以傳達命有定數，為善而增，為惡則削的觀念，然而其所努力建構的意涵，並未有任何深刻的人生情致，皆為粗淺陳舊的道理，⁹⁶不但致使未具命定之旨的原作導向了定數觀念的宣揚，完全曲解了原作的題旨，同時也產生了具有豐富文本意涵的原作意旨窄化的情形。本篇亦從敘事效果去檢驗了這樣的敘述策略，除了全書題材尚保留「誕幻」的風格為《四庫全書》所取外，與唐五代的小說相較，《類事》的敘述特色致使它在人物、情節、主題意涵、情境氛圍等小說要素的展現全面地退化，就敘事美學效果而言，《類事》則遠遜於唐五代的作品。

本篇揭示了《類事》在承襲唐五代小說時，增強議論和弱化記事，並以之共同烘托全書「命定」主旨的作意及其展現過程，可謂具體地呈現出一個宋代小說如何「多講古事」的情況，以及如此講古事在形式和主題上所形成

96 錢鍾書曾對宋詩有如下之評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見《宋詩選註》（北京：三聯書店，2001），序，頁8。此亦可用來評述《分門古今類事》的議論。

的特色。而《類事》在多講古事時，往往對之多作評議，一如《樂善錄》中所見，其中多寓有勸戒的意味，充滿道德的訴求，正印證了魯迅對於宋人小說另一特質的掌握，即「多教訓」⁹⁷之評，魯迅把宋人小說含有教訓的原因，歸於理學的興盛，致使宋人小說中有理學化的情形，李劍國曾針對魯迅的觀點，進一步闡釋所謂的小說理學化，他認為宋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是被規範在理學的藩籬中，小說創作便往往偏重追求懲勸，造成主題的倫理化和作品的道學氣，即使愛情小說都有由情向理傾斜的趨勢，⁹⁸而這種小說創作動機和主題表現的道學化，常表現在作品中的就是概念化和教條化，⁹⁹換言之，就是在作品中有許多訴諸議論的觀點表達，以達到勸世的目的，由此我們便能理解宋人小說為何特好發抒議論的原因了。¹⁰⁰藉由《類事》的敘事策略的探討，正清晰地揭示出宋代文言小說講古事和施教訓的特質，也展現出所謂「理學化」的實際面貌。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唐·李冗著，蕭逸校點，《獨異志》，《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唐·李復言著，王公偉點注，《續玄怪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唐·孟棻著，《本事詩》，《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

唐·段成式著，曹中孚校點，《酉陽雜俎》，《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

唐·袁郊著，李宗為校點，《甘澤謠》，《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

97 同註93。

98 同註1，前言，頁6。

99 同註1，前言，頁4。李劍國所謂的「道學化」實魯迅所說宋人小說含有教訓的「理學化」。

100 錢鍾書於《宋詩選註》的序言中評宋詩「愛講道理，發議論」，見氏著《宋詩選註》，序，頁8。李劍國將之比附於宋代小說，同註1，前言，頁4-5。除了理學興盛導致宋人小說愛好議論，殆亦有好疑的學風因素，康來新則從宋代的「懷疑」學風對小說的影響，來闡釋宋代小說的好議之風。見氏著，《發跡變態——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頁115。

- 唐·唐臨著，朱嵐點注，《冥報記》，《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本。
- 唐·高彥休著，陽羨生校點，《闕史》，《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
- 唐·張鷟著，恆鶴校點，《朝野僉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
- 唐·張讀著，《宣室志》，《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本。
- 唐·康駢著，蕭逸校點，《劇談錄》，《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
- 唐·裴鉞著，穆公校點，《傳奇》，《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
- 唐·鄭處誨著，丁如明校點，《明皇雜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本。
- 唐·盧肇著，王公偉點注，《逸史》，《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本。
- 唐·薛用弱著，劉登閣點注，《集異記》，《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本。
- 五代·王定保著，陽羨生校點，《唐摭言》，《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
- 五代·皇甫氏著，王公偉點注，《原化記》，《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本。
- 五代·孫光憲著，林艾園校點，《北夢瑣言》，《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
- 南唐·徐鉉著，馬志杰、王高旺點注，《稽神錄》，《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本。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3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 宋·李昌齡著，《樂善錄》，《稗海》本，《百部叢書集成》，第6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 宋·沈氏著，《鬼董》，《知不足齋叢書》本，《百部叢書集成》，第474冊。
- 宋·委心子著，金心點校，《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宋·委心子著，《分門古今類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7冊。
- 宋·皇都風月主人編，《綠窗新話》，臺北：世界書局，1958。
- 宋·晁公武著，《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7。
- 宋·陳振孫著，《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歐陽修等著，《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65。
- 宋·羅燁著，《醉翁談錄》，臺北：世界書局，1958。
- 元·脫脫著，《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
- 明·佚名輯，《唐人百家短篇小說》，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明·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6冊。
- 清·蔣光煦校，《唐摭言》，臺北：世界書局，1975。

二、近人論著

- 《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 1993 《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王克儉 1994 《小說創作隱性邏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國良 2001 〈談《太平廣記》——以文獻學為主的考察〉，《文獻與資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頁183-207。
- 李劍國 1993 《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
- 李劍國 1997 《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
- 李樂民 2002 〈李昉的類書編纂思想及成就〉，《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5: 115-117。
- 康來新 1996 《發跡變態——宋人小說學論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 康韻梅 2004 〈《分門古今類事》中的唐五代小說〉，《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0期（12月將出刊）。
- 黃暉 1990 《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 陳湘懷 1996 〈論《太平廣記》的文學文獻價值〉，《撫州師專學報》1996.4: 48-50、65。
- 魯迅 1991 《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魯迅 1992 《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
- 錢鍾書 2001 《宋詩選註》，北京：三聯書店。
- E.M.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著、李文彬譯 1985 《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
- Steven Cohan（史蒂文·科思）、Linda M. Shires（琳達·夏爾斯）著，張方譯 1997 《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臺北：駱駝出版社。
- W.C.布斯（Wayne C. Booth）著，華明、胡蘇曉、周憲譯 1989 《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William Kenney 著，陳迺臣譯 1977 《小說的分析》，臺北：成文出版社。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he *Fenmen gujin leishi*

Yun-mei Kang *

Abstract

The *Fenmen gujin leishi* 分門古今類事 is a collection of fiction compiled by Wei Xinzi 委心子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is work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Yiwenzhi* 藝文志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it is classified as a work of fiction under the category of philosophy, thus suggesting that it was the result of meaningful creation rather than being simply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This essay looks at the large number of re-written short stories from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included in *Fenmen gujin leishi* to show how this work use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emphasizing discussion over story-telling, showing signs of being a conscious reworking, and making the plot more reasonable to develop a clear, unified theme of determinism that in turn gives the work the strong sense of being a wake-up call to a slumbering world. In terms of the work's de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 we can clearly see elements such as the weakening of character, a loosenes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a lack of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nd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atmosphere, all of which go to show how the work uses story-telling to achieve its prescriptive aims even as aesthetic standards are lowered. This discussion further serves to give a concrete example of how writers from the Song used stories from previous dynasties and fleshes out Lu Xun's 魯迅 claim that fiction from the Song is charac-

* Yun-mei K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erized by its didactiveness and telling the stories of previous dynasties.

Keywords: *Fenmen gujin leishi* 分門古今類事,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Song dynasty, short stories, narrative strategies